

况鍾

蔣星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27.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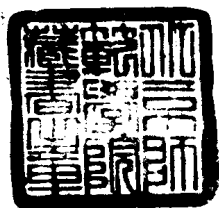
况 鍾

蒋星煜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2829



上海人民出版社

832829

责任编辑 刘伯涵
顾孟武
封面题字 胡文遂
封面装帧 邹纪华

况 鍾

蒋星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插页 1 字数 73,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600

书号 11074·478 定价 (六)0.32 元



况 鍾 像

今同承

晚渡江關歲歲數年

句宜愧我猶千里極字

分君能一知否君昨

同題

觀歲來氣令嘉佳江樓

重東愛比夷承柏堂

獨芳名健馬劇

予与兄太子伯律同毛

李人言春梓見同王

賴世為詩見同王知

昨東望樓公室高唐賦

郭遠中其地後漢平陽

皆未與君降

聖書命伯律守折讓亦不

巡撫嘉南病郡直轄

與太宗伯城公事其定

為事二人知是

命於二十二年夫伯律

除成縣縣丞其弟

總花如玉似園修少

公進行之作廷言

不結意德澤為王

以終卷

不遠去咸三月既望

在德大史實治王郭

左德大鼓房劇

周忱贈詩手迹
(現藏江西省博物館)

目 次

第一章	“仁宣之治”及其人事行政·····	1
一、	朱高炽和朱瞻基·····	1
二、	江西人的政治集团·····	6
三、	三途并用的人事制度·····	10
第二章	况锺的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15
一、	家世与复姓的经过·····	15
二、	年轻书吏到朝廷命官·····	17
第三章	初任苏州府知府·····	23
一、	领敕书赴任·····	23
二、	整饬吏治，自己也被控告·····	29
三、	减削田赋，以苏解民困·····	34
四、	废止苛捐杂税·····	39
五、	清理军籍，释放平民·····	42
六、	与成均发生矛盾后丁忧回乡·····	46
第四章	复任、三任苏州府知府·····	50
一、	夺情复任·····	50
二、	缉拿抢劫官军·····	52
三、	兴修太湖一带水利·····	55
四、	设济农仓，防备饥荒·····	57
五、	修建儒学，培养人材·····	60
六、	纠劾不法的监察御史·····	63

七、	提拔和培养属官	66
八、	任满离苏	67
九、	去而复来,三任苏州府知府	68
第五章	周忱与况鍾	72
一、	理财名臣周忱	72
二、	周忱操守上的缺陷	76
三、	周忱与况鍾的合作	78
第六章	几个重大问题的说明	82
一、	况鍾家庭成员的生卒	82
二、	和宦官们的关系	84
三、	十五贯事件的可能性	87
第七章	关于况鍾的文物与文艺作品	91
一、	肖像的流传	91
二、	况公祠	94
三、	《况鍾复任唱和诗卷》和《秋江送别诗叙》	97
四、	朱素臣的《十五贯》	99
第八章	历史人物况鍾评价	103
一、	况鍾在历史上的作用	103
二、	古典文献论况鍾	109
三、	当代史学家论况鍾	113
后 记		115

第一章 “仁宣之治”及 其人事行政

一、朱高炽和朱瞻基

明代经过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这两个雄才大略的君主经营以后，不仅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使人民能够在比较安定的生活中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并且在北方和东南亚一带显示了军事方面的声威，基本上保障了边境的安全。先后继承皇位的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是在这样一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得到了暂时和缓的历史条件下的两个小心谨慎的守成者。所以《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的作者谷应泰把这两个人比作周代的成王、康王和汉代的文帝、景帝，并且在书中列入《仁宣致治》的专章，以叙述他们的守成事业^①。

^① “仁宣之治”是一般的提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八称作“仁宣致治”。

朱高炽即位以后，替朱棣的残酷镇压做了不少善后工作，例如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刑部尚书吴中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反对朱棣的向北方用兵，因而被下狱治罪，朱高炽均予开释复职。同时被释放出狱的前朝官员很多，较知名的有右春坊大学士黄淮、洗马杨溥、正字官金问等，分别被任为通政使、翰林院学士、翰林院修撰之职。方孝孺、铁铉、景清等人因始终效忠建文帝朱允炆，拒绝向朱棣俯首称臣，因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灭门灭族的大屠杀，未死的家族被押送到教坊等处为奴为娼，朱高炽也恢复了他们的自由。

朱高炽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也是比较关心的，当他听闻山东、徐、淮一带发生了灾荒，而地方官员仍在向灾民们催缴税、粮的情况时，便把吏部尚书蹇义找来，问他是否确有此事，证实后，便命令阁臣杨士奇立即起草减免税、粮的诏书。杨士奇说：“减免税粮的事情应该先让工部和户部知道。”朱高炽说：“以后再通知他们就是了。现在情况很紧急，就象救人于深水之中一样，稍一迟缓就会死人的。如果大家商量，可能有些官员担心朝廷开支很大，一定不会干脆地同意削减农民负担的。”说着就唤太监把文具搬来，让杨士奇把减免税、粮的诏书拟好，朱高炽看了一遍，立即颁发了出去。这时候朱高炽对杨士奇说：“你现在可以对别的大臣们去说，我已经把山东、徐、淮今年的税、粮全免了”。有一次工部奏请向民间征布和漆以修缮兵器，朱高炽认为这种方式、方法最容易滋生流弊，批令改用官钞在市面上购买。象这类事例是比较多的。

关于贪污扰民的官员和宦官，朱高炽都加以处理，有太监在外面以采办金珠为名荼毒军民，朱高炽即予召回。

朱高炽很重视御史的作用和人选，尤其重视负责领导御史们进行监察工作的都御史的作用和人选，希望都御史能在廉洁清正方面做御史们的表率，这样文武百官对于都御史和御史就有所敬畏、有所顾忌。因此他要求吏部审慎而严格地多方面物色都御史和御史的人选，以收维护风纪的实效。

对于阁臣们的进言进谏，朱高炽心胸也比较宽广，颇有容人之量，大理寺少卿弋谦谈论事情往往过于偏激，有时使朱高炽下不了台，朱高炽一方面让杨士奇草拟诏书，对弋谦的态度作了指责，另一方面对弋谦信任不衰，不仅不加惩处，而且提升为副都御史。有宦官在四川采办木材，对民间滋扰得很厉害，朱高炽就派弋谦去彻查，对弋谦说：“我知道你素来廉洁清正，你替我认真严肃地查办就是，不要有任何畏惧和顾虑”。

虽然朱高炽执政的时间很短，他的年号洪熙元年（1425年）就没有再延续下去了，但《明史纪事本末》作者谷应泰说他“在位仅十月，而政具举”，作了相当高的评价。

朱瞻基年号宣德，在位有十年（1426—1435年）之久。他有某些比较开明的帝王的清醒头脑，对于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对于一些粉饰太平的无聊事情很厌恶。礼部尚书胡濙有多次上表祝贺所谓“祥瑞”，朱瞻基觉得献白鸟献骆虞这些事情实在毫无意义，对胡濙说：“现在天下还有许多人没

有安居乐业，没有什么‘祥瑞’可言”。因此，不准上表。这和后来明世宗朱厚熜的喜欢阿谀，对献白鹿献仙桃的奸佞大加赏封，成为鲜明的对比。

山东青州的地方官员请求动用官仓存粮赈济饥荒，户部主张派员查明灾情以后再决定是否批准，朱瞻基说：“等到户部派人去查清楚灾情，人早饿死了”。于是立刻同意了青州地方官员这一项紧急措施。当时山西有一部分灾民逃荒到了河南南阳，被当地官府逮捕，因而致死的也不少，朱瞻基听到这方面的反映以后，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说：“老百姓因灾荒而逃奔他乡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从前宋代的名臣富弼做青州知府时，对老百姓的饮食起居和病痛医药无不关心，安排老百姓在山林采伐，在河湖渔捞，五十万人虽遇灾荒，都能度过。现在居然对灾民逮捕或驱逐，岂不是太不仁了吗？”于是命令禁止这样做，并由朝廷直接派人到山西、河南赈济灾民。

在惩办贪官污吏方面，朱瞻基做得比朱高炽更为严厉而坚决，左都御史刘观职位相当高了，贪污确凿有据，即予撤职，代之以原任通政使的顾佐。浙江布政司参议王和、袁昱和陕西按察司佥事韩善贪污，均被削职为民。这些被撤职被惩办的官员的重新起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吏部作了布置，朱瞻基也很少批准。工部尚书吴中为讨好宦官杨庆，送给他大量官木官瓦，盖了一座宏伟华丽的宅第，朱瞻基查明属实后，将吴中逮捕，下狱治罪。

官员与官员之间发生了矛盾，朱瞻基决不做无原则的和事佬，一定要查明真相，弄清楚是非曲直。宦官裴可

烈^①监事浙江，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按察司林硕却是执法如山的铁面无私的人物，裴可烈感到行动多少受到拘束，要拔去这一颗眼中钉，便诬告林硕“沮格诏令”，朱瞻基让林硕自己来北京申诉辩冤，并且亲自处理这一件事。对林硕说：“你不要害怕，一切照实际情况说就是。”于是林硕照实际情况作了详细陈述，朱瞻基知道林硕并无错处，给予驰驿复任的荣誉。因为裴可烈诬告，朱瞻基罢斥了他的官职，后来又把裴可烈处死了。

正是由于朱高炽和朱瞻基不是那种偏听偏信、喜欢阿谀奉承的皇帝，并且做了不少符合人民愿望或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较多的积极作用。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出现了“仁宣之治”的小康局面。人材的发掘、培养和提拔在当时是有显著成绩的。况锺的出现正好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况锺所以能从一个书吏做到全国最富庶的苏州府知府，不是一件小的事情，这和朱高炽、朱瞻基的政治风度和施政方针是不可分的。

我们说“仁宣之治”是一个小康局面，也只是从基本情况而立论，决不是说朱高炽和朱瞻基就很尊重所有的大臣了，他们也有专横残暴的一面，例如侍读李时勉抗疏言事，

① 王世贞：《拿山堂别集》卷九十一《中官考》：“裴可烈亦以贪暴下锦衣卫狱拷死”。又《明史》卷一百六十一《林硕传》：“其后宁波知府郑瑒劾可烈不法，可烈竟罢去。”《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列传》：“宣宗时，袁琦令阮巨队等出外采办，事觉，琦磔死，巨队等皆斩。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诛之”。也有书作裴可立的，但大部分史籍是用裴可烈之名。

庭对不屈,引起朱高炽的恼怒,命金瓜力士当场把李时勉打断肋骨三条。

附带要谈一谈,明英宗朱祁镇,在正统之初,人事行政和财政经济基本上仍是按照朱瞻基的旧规章做的,变动不大。所以朱瞻基所慎重选派的九个知府之中,就有况鍾、陈本深、莫愚、赵豫四人是经过朱祁镇批准九年任满后继续连任,并给三品俸,以为奖励。对于减轻人民负担问题,朱祁镇也很重视。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他即位不久,户部要求重新审核苏州府、松江府要求减免的荒田税粮,朱祁镇“以核实必增额,为民患,不许”。正统五年(1440年),又“免苏、松、常、镇、嘉、湖水灾税粮”。因此也可以说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君主。

二、江西人的政治集团

封建时代政治上经常出现集团宗派,而某些集团往往是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的,在明代的永乐、洪熙、宣德、正统(1403—1449年)这一个时期,朝廷中是存在着一个江西人的政治集团的,解缙是这一个集团的旗帜,解缙死后,成为旗帜的是杨士奇^①。

江西籍的解缙、金幼孜、杨士奇、胡俨本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旧臣,以迎附朱棣而被留用。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

^① 这一种宗派集团的情况,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注意到了,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第三卷中有《内阁同乡》条,说到:“永乐初元选翰林臣入内阁,而江西居其五。”

朱棣开文渊阁，以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入值，参与机密大事，称之谓内阁，这七个人之中，除黄淮和杨荣外都是江西人。

永乐二年(1404年)春三月甲申科是解缙、黄淮任主考，会试第一的杨相是江西泰和人，廷试第一的曾桀是江西永丰人，廷试第二第三周述、周孟简兄弟是江西吉水人。朱棣又命解缙选曾桀等二十八名进士就学文渊阁，除上述的杨相、曾桀、周述、周孟简之外，还有王直、罗汝敬、李时勉等也都是江西人，自愿就学的周忱提出请求后，被朱棣允许了，又多了一个江西人。这些人都是以后二三十年之间政治上的显要人物，有的成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等人的智囊。

现在我们把永乐到正统的内阁首辅、翰林院的主要成员、十六次中央考试的考官和中式为首名次总数以及属于江西籍的人数列成下列三表：

一、内阁首辅	永乐	洪熙	宣德	正统	共计
总 数	4	1	1	2	8
江西 人	3	1	1	1	6

二、翰林院	学士	侍读学士	侍讲学士	祭酒	共计
总 数	14	9	10	9	42
江西人	8	8	1	3	20

三、中央考试	考官	会试第一	廷试第一	廷试第二第三	共计
总 数	32	16	16	32	96
江西 人	14	4	6	8	3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江西人在政治上的雄厚势

力。其中最起决定作用的是杨士奇，在这一时期他做了四十二年内阁阁员，二十一年内阁首辅。其次是曾荣，他曾多次任中央考试的考官，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曾任《永乐大典》副总裁，《三朝实录》的撰修者，朱高炽把他作为身旁最可亲信的一个学者，曾故意找些冷僻的古书中的典故来问他，他竟能立刻对答出来，要他写《天马海青歌》，他也援笔立就，他的言谈，对朱棣、朱高炽等有一定的影响。

这一些江西籍的政治人物，连居住也是集中在一起的，王直说：“永乐二十一年三月予以内艰服阙，至京师主于东城予姻家欧阳君允和，而杨先生士奇则居城西之金城坊，所与邻者同邑余君学夔、刘君朝宗，临川王君时彦，吉水钱君习礼、张君宗琯，周君恂如、周君功叙，皆余旧也。先生重乡谊，笃世好，不欲弃予于远，思求近宅以处之。”^①后来王直居然搬到杨士奇对门去住了。“重乡谊，笃世好”这六个字是对于这个政治集团的旗帜杨士奇的比较含蓄的性格或政治倾向的刻划。王直又说：“数十人者旦则各出营职，迨暮而归则从容相过，焚香淪茗，谈笑移时而后去”^②，说出了他们活动的一些方式方法。他们之间亲密到什么程度呢？可以从“酒酣忽起舞，四座意尽倾，高歌杂雄辩，泠泠金石声”^③的描写中看出他们的融洽欢欣以及那种不可一世的自负气概。

① 同治刻王直《西昌王抑庵集》卷十六《移居唱和诗序》。

② 同治刻王直《西昌王抑庵集》卷十九《送李通判复任序》。

③ 同治刻王直《西昌王抑庵集》卷二《曾侍讲宅燕集》，曾侍讲就是侍讲学士曾荣。

以杨士奇为首，他们的具体政治活动是通过科举保荐广泛树植势力，象王直、曾桢、张宗璉、周忱等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得到杨士奇直接或间接的提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的主张和行动一定是一致性的，例如最初颇为赏识况鍾的礼部尚书吕震，便经常和这一些人意见相左，而被非议的。用诗文相互酬唱，以鼓吹彼此的才华和政绩，以影响社会舆论和统治者的视听，也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也许有人以为这一种诗文相酬唱不一定是从“重乡谊，笃世好”的宗派观念出发的，那末我们不妨听一听这些显要人物的自白：周述曾说：“余与况侯同朝，兼有桑梓之谊，其素重为人，乃今政成而能有惠爱于苏人若此，宁不为之深喜欤，于是书以识于后，使欲知侯者有所考焉。”^①胡俨也说：“况侯余乡人也，其善政既已诵于吴人，而斯举尤为知务，故乐为之书。”^②这不是偶然的。

一般认为江西政治集团早期领袖人物解缙之死，吕震要负较多的责任。至于李能和尹昌隆两案，也有吕震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则还不是与江西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吕震和江西政治集团领袖杨士奇的公开争执有多次，大理寺少卿弋谦向朱高炽进谏，吕震为了讨好皇帝，说弋谦诚心沽名钓誉，弋谦险遭不测。但杨士奇却强调“主圣臣直”^③，力保弋谦，结果朱瞻基没有把弋谦治罪，反而更重用了。另外一件事是国丧除服的问题，杨士奇不同意“丧服已逾二十

① 道光重刻《况太守集》卷四周述《张太史赠太守况公前传读后》。

② 《四库全书》本钱谷《吴郡文粹续集》卷三胡俨《苏州府重修儒学记》。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八《仁宣致治》。

七日，请即吉”，而“震勃然变色，诋其异己”^①。也就是说吕震直接指责杨士奇是搞宗派集团而排斥异己。

这一个政治集团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这一个政治集团基本上能够向皇帝反映一些民间疾苦，站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开明的一方面也是事实。除了在树植势力这一件事上很露骨以外，这一政治集团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劣迹。况锺在政治上的一帆风顺，和这一个集团的提拔和鼓吹是分不开的。

在杨士奇死去以后，集团开始解体，但是江西人在朝廷中的声势还是维持了一个时期，景泰年间有陈循、萧镃，成化年间有陈文、彭时、刘定、彭华、尹直等。当然，和杨士奇任首辅的时候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三、三途并用的人事制度

明代初叶，对于吏员的人选很审慎，而吏员也很自尊。据《续通典》卷二十二记载，据说曾有一个高级官员有病，扶着拐棍而行。当他把拐棍交给身旁的书吏时，书吏拱手而立，不把拐棍接过去。事后书吏对这个高级官员说：“我是你的属吏，不是你的家僮。多做一点琐事无所谓，我是担心由此把规矩都破坏了”^②。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件事是赞赏的，曾经说给群臣听。这是因为当时的书吏都是文理通达、书法谨严的书生所充任，而由各级地方官员亲自选拔招聘的。

当时人事制度的显著特点是三途并用，所谓三途是指

① 陈鹤：《明纪》卷十。

② 《续通典》卷二十二。